

轉折年代知識青年的文學視界 ——以《紅黑》為考察對象

蘇敏逸*

摘要

1927 年至 1928 年間，沈從文、胡也頻和丁玲這三位在北京展開創作生涯的文學同志先後到了上海，並在上海創辦紅黑出版社，於 1929 年一月出刊文學雜誌《紅黑》。儘管由於經濟條件的薄弱與文學理念的差異，這份刊物只出刊了八期，在 1929 年八月便宣告結束，但透過這份刊物，卻可以發現二〇年代末，思想轉折時期許多有趣的現象。第一，「紅黑」的刊名展現革命時代知識青年對「文學」與「革命」的浪漫熱情，由此可見知識青年對轉折年代社會與文化氛圍的回應。第二，《紅黑》出刊的 1929 年，也正是沈從文、胡也頻和丁玲三人創作的轉折時期，他們在《紅黑》中刊出的作品，清晰地呈現三人的轉折軌跡。第三，將三人的作品並置合觀，可對照三人在思想與文學表現上的差異，也可看到他們與中國文壇和革命現實的對話關係。本論文將以《紅黑》為考察對象，聚焦在上述三個問題，論析這個期刊所呈現豐富的文學視野，以及文學與現實社會、歷史的交互作用。

關鍵詞：《紅黑》、沈從文、胡也頻、丁玲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從辛亥革命到整個二〇年代，是中國政治、社會勢力重新洗牌、盤整，各種思潮紛至沓來、自由發展的時期，在內憂外患的國家處境和社會改革的強烈欲望下，革命浪潮也接踵而至。二〇年代初，代表文化改革的五四運動落潮後，北伐革命軍所號召的國民革命在廣州重新凝聚社會共識，力圖完成掃除軍閥的統一大業。由國、共兩黨合作組成的國民革命軍因 1927 年四月起蔣介石（1887-1975）的清黨行動而宣告破裂，清黨造成的大屠殺讓原本聲勢浩大的北伐革命中挫，也讓許多知識份子陷入徬徨、絕望的痛苦處境。魯迅（1881-1936）著名的〈《野草》題辭〉即寫於 1927 年四月廣州清黨之後，朱自清（1898-1948）的〈那裡走〉、¹ 葉聖陶（1894-1988）的長篇小說《倪煥之》和茅盾（1896-1981）的《蝕》三部曲等從不同角度呈現北伐革命中挫後低迷的社會氛圍與知識份子心靈狀態。

二〇年代國民革命的中挫對文壇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這影響大致有二：一是「革命」的內涵及型態產生變化，知識份子與青年學生因革命現實行動的受挫而轉以文學創作與思潮譯介等方式來實踐革命理想，並藉此宣洩革命激情；而革命的思想內涵則以馬克思主義等左翼階級理論取代原本以「反帝、反封建軍閥」為精神主軸的國民革命，由此形成 1928 年起的「革命文學」運動。² 二是文壇重心的轉移。

¹ 朱自清，〈那裡走〉，《朱自清全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 年），卷 4，頁 226-244。

² 〔美〕舒衡哲（Vera Schwarcz）著，劉京建譯，《中國啟蒙運動——知識份子與五四遺產》（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年）一書的第四章〈革命運動的嚴峻考驗，1925-1927〉及第五章〈邁向新啟蒙，1928-1938〉中，從中國啟蒙運動發展的脈絡論述二〇年代中期的清黨屠殺對知識份子心靈產生的重創及其影響，由此形成二〇年代末至三〇年代，民族救亡意識與馬克思主義唯物理論及階級理論相結合的「新啟蒙運動」。而程凱，《革命的張力——「大革命」前後新文學知識份子的歷史處境與思想探求（1924-193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年）一書則結合文學與政治、社會、思想的發展歷史，細緻地分析二〇年代中、末期，

由於二〇年代中期南方國民革命勢力的興起，以及 1928 年北伐結束後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政治中心由北洋政府所在的北京轉移到南京，文化中心也由五四運動的發起地北京轉向新興的現代化大都市上海。曠新年曾提到：

從 1927 年起，各地的文人好像受著神秘的力量驅使似的，像候鳥一樣成群結隊、不約而同地離開他們原來的棲居之地向上海進發。最為引人注目的是新文化運動發祥地北京的文化人的大規模南下。1928 年文化人向上海的遷徙造成了中國現代思想文化一次歷史性的大轉移。³

從北新書店與二〇年代中期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陣地《語絲》、《現代評論》等雜誌的南遷，可以看到文壇與文化重心南移的具體軌跡。

文學陣地的轉移也影響了作家個人的行跡。二〇年代中期在北京走上創作之路的沈從文（1902-1988）、胡也頻（1903-1931）和丁玲（1904-1986）三個文學好友，先後在 1927 至 1928 年間來到上海。在上海，三人靠賣文為生，對繁榮、複雜但充滿市儈氣息的文化市場並不滿意，想要開闢一個自己的園地來改正唯利是圖的社會習氣，並藉此實踐文學理想。胡也頻以每月三分的利息向父親商借了一千元，在經過兩個多月的籌備之後，三人在法租界薩坡賽路 204 號的住處創辦了紅黑出版社，《紅黑》月刊於 1929 年一月正式出刊，之後並陸續推出「紅黑叢書」。

但他們的出版事業只維持了半年多的時間，《紅黑》月刊在出刊八期之後，於 1929 年八月終刊。根據丁玲在八〇年代的回憶，結束出版工作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經濟上的壓力：「《紅黑》雜誌辦了半

在不同的政治光譜中，知識份子的思想差異及思想轉變。

³ 曠新年，〈1928 年的文學生產〉，《現代文學與現代性》（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8 年），頁 85-86。

年多，雖然沒有賠本，但是每期刊物交給發行者後，錢總是收不回來。而每月要付三十元利息，對我們是沉重的負擔，實在辦不下去了。」二是思想上出現分歧：「沈從文跟我們的思想碰不攏來。這時胡也頻左傾了，他讀了盧那察爾斯基、普列漢諾夫的書。」⁴ 儘管由於經濟條件的薄弱和文學理念的差異造成了《紅黑》的短命，但透過這份刊物，卻可以發現二〇年代末，思想轉折時期許多有趣的現象。

本論文所謂的「轉折時代」大致可包含兩層涵義。首先，從政治、社會氛圍及革命觀念等時代背景來看，《紅黑》出刊的 1929 年，正是國民革命陣營分裂之後，政治勢力與思想觀念重新盤整的年代。原本打著「反帝、反封建軍閥」旗號的國民革命軍因蔣介石的清黨而分裂為敵對陣營，直接衝擊知識份子對「革命」的態度。許多知識份子因對革命現實的殘酷感到痛苦和幻滅，因而遠離社會革命現場，秉持著五四時期知識份子文化改造的精神，退守原本從事的書齋研究或文化教育等工作，著名的如周作人（1885-1967）、朱自清、葉聖陶等人。而寫出《蝕》三部曲的茅盾則在革命失敗的幻滅感中重新思考與調整，之後又回到左翼的行列。另一方面，隨著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政治勢力日漸穩固，也逼迫秉持左翼政治理念的「反對派」在「革命文學論爭」的混戰之後重新整合，並在共產黨的組織下，於 1930 年三月在上海成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⁵ 隨著「左聯」的成立與左翼文學的日漸蓬勃，南京政府則在同年六月發表〈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

⁴ 丁玲，〈早年生活二三事〉，收入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卷 10，頁 308。

⁵ 程凱對「左聯」成立的討論中，除了從「革命文學論爭」之後文壇的分化到重整看「左聯」成立的思想基礎，更強調共產黨在革命失敗之後爭取從「文化工作」擴大革命隊伍，並成立具有社會號召力的公開組織的政治需求，因此加速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程凱，《革命的張力——「大革命」前後新文學知識份子的歷史處境與思想探求（1924-1930）》，頁 328-332。

言》，以「民族主義文藝」與之對抗。⁶ 從三〇年代政治左、右翼光譜的逐漸清晰與對立，以及「革命」內涵由馬克思主義階級論的左翼政治理論取代國民革命，回過頭來看二〇年代的歷史發展與文學思潮，可以發現國民革命失敗到「革命文學論爭」激烈的 1928-1929 年，正是中國政治、社會、歷史、思想的轉折年代。其次，從《紅黑》文學青年的文學關懷與創作發展來看，1929 年也可以說是他們文學生命的轉折時期，這可以從以下三點來觀察。第一，「紅黑」的刊名展現革命時代知識青年對「文學」與「革命」的浪漫熱情，由此可見知識青年對轉折年代社會與文化氛圍的回應。第二，《紅黑》出刊的 1929 年，也正是沈從文、胡也頻和丁玲三人創作的轉折時期，他們在《紅黑》中刊出的作品，清晰地呈現三人的轉折軌跡。第三，將三人的作品並置合觀，可對照三人在思想與文學表現上的差異；而從《紅黑》所刊登的作品，也可看到他們與中國文壇和革命現實的對話關係。本論文將以《紅黑》為考察對象，聚焦在上述三個問題，論析這個期刊所呈現豐富的文學視野，以及文學與現實社會、歷史的交互作用。

二、從《中央日報》副刊〈紅與黑〉到《紅黑》雜誌

在現代文學史上，沈從文因《邊城》、《湘行散記》及數量龐大的湘西題材小說而成為中國著名的鄉土抒情小說大師。胡也頻的留名與其說是他的文學創作，不如說是他作為 1931 年犧牲的「左聯五烈士」成員，以及他作為丁玲第一任丈夫的身份。丁玲早年以其筆下對「夢

⁶ 有關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後的文藝政策，包括 1928 年提出「三民主義文藝」，到 1930 年六月，以迎合國民黨統制文藝政策，對抗左翼文學發展為目的的「前鋒社」成立，發表〈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等過程，可參見倪偉，《民族想像與國家統制——1928-1949 年國民黨的文藝政策及文學運動》（臺北：人間出版社，2011 年），第一章至第三章，頁 19-216。

珂」、「莎菲」等摩登女郎和新式女性知識份子的細膩描摹揚名於文壇，在胡也頻被國民黨槍決之後，丁玲加入了共產黨陣營，投入共產革命的行列，在往後的作品中一改莎菲時期尋求人生出路的苦悶宣洩，更為理性、客觀地探索個人與集體、文學與革命之間的矛盾衝突，以及各種衝突之間磨合的可能性。

但在二〇年代中期「北京時期」的三人，可以說都是「北京公寓」裡的文學青年。姜濤在《公寓裡的塔——1920 年代中國的文學與青年》一書中從空間的流動說明文學青年如何在社會場域的分化中尋求新的社會位置。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席捲和洗禮下，許多青年從農村來到北京尋求啟蒙後的人生出路和理想實踐，他們到北京之後多半先依附於傳統鄉土人際網絡型態的「同鄉會館」，在習慣了北京生活之後，便逐漸往象徵知識、新思想和文化權力的高等學府附近移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以老北大紅樓為中心，沙灘一帶的學生公寓。⁷ 這裡聚集了許多愛好文學的朋友，他們在這裡尋找個人進入「現代社會」的可能性。二〇年代中期，沈從文等三人北京時期的重要居所，都在沙灘一帶。當時儘管三人的性格、氣質與生命經歷並不相同，但思想上的差異尚未被凸顯，都只是熱情又苦悶的文學青年。

1927 年至 1928 年間，三人先後來到上海。為了謀生，胡也頻在沈從文的介紹下，從 1928 年七月間開始擔任《中央日報》副刊〈紅與黑〉的編輯。《中央日報》是國民黨機關報，主編是「現代評論派」的彭學沛（1896-1948），與沈從文相熟。根據丁玲在 1980 年的敘述，雖然彭學沛並不干涉胡也頻實際的編輯工作，但由於不久之後，「我們逐漸懂得要從政治上看問題，處理問題」，⁸ 於是只做了三個多月，

⁷ 姜濤，《公寓裡的塔——1920 年代中國的文學與青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157-166。

⁸ 丁玲，〈胡也頻〉，收入張炯主編，《丁玲全集》，卷 6，頁 94。這段文字意指胡也頻和丁玲因思想左傾，政治理念與國民黨不同，而不願為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工作。

胡也頻便辭掉這個待遇優渥的工作。在辭職之前，三人已討論《紅黑》雜誌的具體工作。當胡也頻停編《中央日報》副刊〈紅與黑〉時，《中央日報》也在同年的十一月在滬停刊，遷往南京。

《紅黑》的刊物名稱和《中央日報》的副刊〈紅與黑〉明顯有著連續性的關係，沈從文便曾提到：「這紅與黑成為此後《紅黑》雜誌的胎兒，正因為這刊物，後來才有《紅黑》的計畫。」⁹ 黃蓉在其博士論文《丁玲文學編輯活動研究》中則指出，胡也頻曾在副刊〈紅與黑〉即將停刊之際，於 1928 年 10 月 26 日在副刊上發表〈《紅黑》創作預告〉一文，強調「我們希望因了修養與訓練，可以用作品來作證據，將文學價值提高到時行的一般低級趣味以上，故籌備一種月刊，繼續紅與黑，所以便有了紅黑創作。」¹⁰ 原本副刊名稱〈紅與黑〉就是由沈、胡、丁三人共同討論決定的，而新出版的刊物以《紅黑》為名，正是希望經過副刊的努力耕耘而擁有的〈紅與黑〉讀者，能在副刊〈紅與黑〉停刊之後，轉而支持自己創辦的《紅黑》。¹¹

但若如丁玲所說，胡也頻是因「懂得要從政治上看問題」才辭去《中央日報》副刊編輯的工作，顯然有意與《中央日報》背後的國民黨劃清界限，那麼《紅黑》又何以要沿用《中央日報》副刊〈紅與黑〉的名稱呢？在這個問題上，張武軍的〈「紅與黑」交織中的「摩登」——1928 年上海《中央日報》文藝副刊之考察〉一文提供了可能的解答。張武軍在文中特別針對上海時期《中央日報》的政治思想傾向進行考察。1927 年國民黨清黨後，《中央日報》於 1928 年二月一日在上海發刊，此時的社長潘宜之（1892-1944）是桂系的重要人

⁹ 沈從文，〈記丁玲〉，《沈從文全集（傳記）》（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 年），卷 13，頁 113。

¹⁰ 黃蓉，〈丁玲文學編輯活動研究〉（上海：復旦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論文，2005 年），頁 21。

¹¹ 黃蓉，〈丁玲文學編輯活動研究〉，頁 22。

物，時任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主編彭學沛是「現代評論派」。在北京時期，《現代評論》向來被視為英美自由主義的大本營，¹² 而彭學沛本人在政治思想上則接近於發表《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¹³ 在國民黨因清黨屠殺造成知識份子與學生群眾的反感後，為國民黨改組派提供理論基礎的陳公博（1892-1946）。彭學沛本人在《中央日報》上發表的文章，致力於推動黨內的民主化，論述中也不乏左翼階級理論的思想，並因此凝聚了對蔣介石清黨屠殺同樣不滿的國民黨員和革命青年的支持。也許正因為如此，當 1928 下半年蔣系與桂系的衝突矛盾日益白熱化後，南京政府決定將《中央日報》遷往南京「就地看管」，於是上海《中央日報》在 1928 年 10 月 31 日停刊，原編輯群卸任。¹⁴

二〇年代中期的國民革命隊伍從組成、發動到分裂的歷程中，不僅國、共雙方的政治理念不同，國、共兩黨內部各派系間對於「革命」的設想、理念和內容也不盡相同，其中或複雜或細微的差異需要進行更仔細的鑒別。但從張武軍對〈紅與黑〉的考察可以暫時解釋幾個問題。首先，在丁玲的敘述中，胡也頻出面編輯〈紅與黑〉是出於沈從文的介紹，但是在沈從文的敘述中，胡也頻出任〈紅與黑〉編輯時，沈從文正陪伴母親到北方養病，在秋天時才回到上海。¹⁵ 兩人說法並

¹² 《現代評論》以胡適為核心，聚集了留學英美，當時在北京大學任教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在文藝方面的代表有胡適、陳西滢（1896-1970）、楊振聲（1890-1956）、丁西林（1893-1974）等人，在政治、社會等時事評論方面有名的則為王世杰（1891-1981）、周鯁生（1889-1971）、燕樹棠（1891-1984）、陶孟和（1887-1960）等人。參見錢理群，〈《現代評論》：英美派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聚集〉，收入錢理群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1915-192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415-420。

¹³ 陳公博，《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北京：北京瀚文典藏文化，2013 年影印中華民國十七年〔1928〕五月版本）。

¹⁴ 張武軍，〈「紅與黑」交織中的「摩登」——1928 年上海《中央日報》文藝副刊之考察〉，《文學評論》2015 年第 1 期，頁 99-109。

¹⁵ 沈從文，〈記胡也頻〉，《沈從文全集（傳記）》，卷 13，頁 28-29。

不完全相同，何以造成這樣的誤差？其次，丁玲提到胡也頻擔任編輯之後一段時間，「我們逐漸懂得要從政治上看問題，處理問題」，¹⁶ 因此只做了三個月，便辭去了編輯一職。如果是主動辭職，有意與國民黨劃清界限，何以《紅黑》要延續《中央日報》副刊〈紅與黑〉的名稱？第三，綜觀八期的《紅黑》雜誌，內容具有頗為鮮明的左翼色彩，先後作為〈紅與黑〉和《紅黑》執行編輯主力的胡也頻，在命名上除了「市場知名度」的考量，是否具有思想上的延續性？

儘管後來胡也頻和丁玲走上左翼的道路，在思想上與沈從文分道揚鑣，但在 1928 年，沈、胡、丁三人都是懷有生命熱情，政治（革命）思想與認同尚未完全確立的文學青年，他們面對國民革命隊伍分裂後，各路人馬皆言「革命」，但「革命」內容卻不盡相同這樣混亂也複雜的百家爭鳴時代，他們對於革命的態度以及路線的選擇也不像三、四〇年代之後那樣明確。丁玲提到胡也頻因沈從文的介紹而到《中央日報》擔任文藝副刊主編，三個月之後辭職等等是八〇年代的事，可能因她共產黨員的身份和立場而想為胡也頻替「敵對陣營」國民黨機關報編副刊一事開脫。但事實上 1928 年的胡也頻與丁玲只具有粗淺而素樸的左翼思想，並非堅定的共產黨革命者。而在二〇年代國、共合作的時代氛圍中，國、共雙方的敵對關係也遠沒有三〇年代之後那樣鮮明。同時，儘管當時許多青年和知識份子對蔣介石的清黨屠殺行為不滿，但 1928 年的《中央日報》乃由桂系掌控，並非南京政府所能主導，在思想上也與蔣介石並不一致。胡也頻與主編彭學沛最初的認識也許的確是透過沈從文的介紹，但兩人的相識時間應該是在編輯副刊之前，甚至是北京時期，而非在彭學沛選擇副刊主編時，才由沈從文介紹相識，如此主編（彭學沛）與副刊編輯（胡也頻）之間才有互信基礎。另一方面，胡也頻北京時期的多篇作品曾發表在《現代

¹⁶ 丁玲，〈胡也頻〉，收入張炯主編，《丁玲全集》，卷 6，頁 94。

評論》上，他甚至是《現代評論》第三卷之後發稿最頻繁的三位作家之一，¹⁷ 由此可見胡也頻在編輯〈紅與黑〉之前，便與《現代評論》有密切的往來。而丁玲提到胡也頻只做了三個月便辭職，若以時間來看，胡也頻的辭職事實上是上海《中央日報》「被迫」遷往南京時的編輯群總辭，並非胡也頻基於對「政治問題」有所認識而主動辭職。個人以為，丁玲在〈胡也頻〉一文中對胡也頻擔任〈紅與黑〉編輯的過程有所迴避，意在切割胡也頻與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及自由主義色彩鮮明的「現代評論派」的關係，而她的選擇性敘述與她的生命經驗有密切的關係：丁玲自南京投奔延安以來，便不斷因三〇年代被國民黨逮捕的歷史問題遭受共產黨內部的檢查，並在 1955 年起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批判中成為檢查的重點之一。¹⁸ 一輩子被歷史問題所糾纏和受苦的丁玲在八〇年代做這樣的敘述，有意切割自己和胡也頻與國民黨之間的關係，其敘述時的心理狀態是可以同情和理解的。但回到 1928 年的時空背景，彭學沛當時是國民黨內部的民主派，其政治論述也受到二〇年代末期的思潮影響，具有左翼理論的色彩。因此彭學沛並不干涉胡也頻的編輯，讓胡也頻在副刊〈紅與黑〉中展現自由、熱情，又帶著素樸的左翼理想的編輯風格。而這樣的風格，也一直持續到三人所經營的小小園地《紅黑》中，並隨著胡也頻左翼意識的發展，獲得更完整的呈現。

《紅黑》刊行的 1929 年，也是革命文學論爭暫歇，左翼革命隊伍進行重整的階段，胡也頻在《紅黑》第一期〈釋名〉中，解釋了刊名「紅黑」的意思，在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到熱情的知識青年以文藝

¹⁷ 《現代評論》在第二卷末與第三卷之後最常發稿的三位作家是王向辰（老向，1898-1968）、沈從文和胡也頻，可見在北京時期，沈從文與胡也頻都算是《現代評論》的重要作家。楊義、張中良、中井政喜，《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圖志》（臺北：業強出版社，1995 年），冊上，頁 296。

¹⁸ 參見李向東、王增如，《丁玲傳》（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5 年），冊下，頁 491-539。

面對革命時代的心情：

紅黑兩個字是可以象徵光明與黑暗，或激烈與悲哀，或血與鐵，現代那勃興的民族就利用這兩種顏色去表現他們的思想——這紅和黑，的確是恰恰適當於動搖時代之中的人性的活動，並且也正合宜於文藝上的標題，但我們不敢竊用，更不敢掠美，因為我們自信並沒有這樣的魄力。正因為我們不圖自誇，不敢狂妄，所以我們取用紅黑為本刊的名稱，只是根據於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話。例如「紅黑要吃飯的！」這一句土話中的紅黑，便是「橫直」意思，「左右」意思，「無論怎樣都得」意思。這意義，是再顯明沒有了。¹⁹

儘管〈釋名〉中謙遜地以湖南土話中的「紅黑」之意來說明辦刊的心情，但「紅」與「黑」依然具有高度的象徵意味。「紅」與「黑」直接讓人聯想到法國作家斯湯達爾（Marie-Henri Beyle, 1783-1842）的名著《紅與黑》，在這部以拿破崙時代為背景的小說中，「紅色」代表軍隊，「黑色」代表教會，擴大來說，也就是革命與保守兩股勢力的博弈鬥爭。從法國大革命延伸到二十世紀中國的革命時代，「紅」、「黑」兩種顏色是巧妙的挪用，它凸顯了時代的巨變，意味著一個力圖勃興的民族對新時代的盼望，又富含知識青年對時代的熱烈回應，更呈現了「動搖時代之中的人性的活動」。而〈釋名〉從「紅」與「黑」延伸出來的「光明與黑暗」、「激烈與悲哀」、「血與鐵」等意象，也讓人聯想到魯迅在〈希望〉中提到的「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滿過血腥的歌聲：血與鐵，火焰與毒，恢復與報仇。」²⁰ 這裡同時包含著以文藝改造思想，以革命改變社會的熱情和理想，以及理想在現實衝擊下幻

¹⁹ 胡也頻，〈釋名〉，《紅黑》第1期（1929年1月），收入《民國珍稀短刊斷刊（上海卷十一）》（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2006年），頁1。

²⁰ 魯迅，〈希望〉，《野草》，《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卷2，頁177。

滅和殞落的痛苦與掙扎。《紅黑》如此大張旗鼓地「釋名」，這段文字顯然包含著他們創辦此刊物的所有心情：他們「橫直」要辦《紅黑》，「無論怎樣都得」辦《紅黑》，因為他們無論面對自我的生命或複雜的現實社會，都有許多不吐不快的想法和情緒，《紅黑》既提供他們盡情抒發所思所感的園地，也讓他們擁有小小的安身立命之所。同時，「紅黑」也代表他們面對青春生命和動盪時代中「光明與黑暗」、「激烈與悲哀」、「血與鐵」的種種心情。因此他們三人在這裡所發表的作品，既表現出面對社會現實痛苦困頓，在黑暗中掙扎摸索的心情，也表現出青春生命蓬勃奮發的熱烈激情。

三、《紅黑》時期——沈從文、胡也頻、丁玲的文學轉折

《紅黑》中的創作主體是沈從文、胡也頻和丁玲三人。在八期的《紅黑》中，沈從文以沈從文和甲辰之名發表了〈龍朱〉、〈參軍〉、〈神巫故事之一〉、〈日與夜〉、〈七個野人與最後一個迎春節〉、〈道師與道場〉、〈一個天才的通信〉、〈寄給某編輯先生〉、〈一隻船〉、〈大城中的小事情〉等十個短篇小說；胡也頻發表了〈子敏先生的功課〉、〈便宜貨〉、〈一個村子〉、〈三個不統一的人物〉、〈苦刑〉、〈一個獵人的自敘〉等六篇短篇小說，並在第七、八兩期連載中篇小說《到 M 城去》（《到莫斯科去》）前六節，還以筆名「沉默」發表了〈生計〉、〈夜〉、〈權力與真理〉、〈初醒〉、〈生命的象徵〉、〈風聲〉、〈噩夢〉、〈欲雨的天色〉、〈長風曲〉等九首詩歌；丁玲則發表了〈慶雲里中的一間小房裡〉、〈過年〉、〈小火輪上〉、〈日〉、〈野草〉等五篇小說（參見附錄）。若將三人在《紅黑》中的作品置回到他們個人的創作脈絡中，可以發現 1929 年都是他們創作歷程的轉折時期，這些作品具有承上起下的關鍵作用。概括而言，沈從文找到了以鄉土故事和苗族傳說故事來寄寓情欲苦悶的書寫模式；胡也頻的思想迅速左傾，其作品從個人生命困境和

社會關懷轉向對革命與戀愛議題的書寫；丁玲則逐漸走出「莎菲時期」勇敢倔強卻又騷亂躁動的心緒，更為客觀地審視女性主體價值與現實社會之間的關係。同時，將三人的創作合觀，也可以發現三人共同關注的問題與獨特的文學個性。

（一）沈從文：愛欲書寫的突破與階級意識的靈光乍現

對沈從文來說，1929 年可說是創作大豐收的年份，不但創作量驚人，在寫作方法上也出現了重大的突破，而這突破，便在《紅黑》中留下痕跡。解志熙在〈愛欲書寫的「詩與真」——沈從文現代時期的文學行為敘論〉中以「愛欲書寫」為主軸，貫串沈從文從二〇年代到四〇年代的作品轉變。解志熙指出沈從文二〇年代寫作之初，繼承郁達夫（1896-1945）小說的「自敘傳」精神，他以個人的生命經驗為本，寫出了許多以「生的苦悶」和「性的苦悶」為核心的小說，前者著重在北京生活的貧窮與艱難，後者著重在青年對愛情與性欲滿足的願望及不可得。之後沈從文透過周作人對英國性心理學家葛理斯（Henry Havelock Ellis, 1859-1939）作品的譯介，了解文學藝術足以作為人類情感與欲望的「體操」，具有宣洩、補償或調和人類的情感和欲望需求的功能，又從魯迅和周作人的作品理解節制、抒情的文學手法，逐漸形成三、四〇年代以文學包裹愛欲願望的寫作形式。²¹

發表在《紅黑》中的〈龍朱〉、〈參軍〉、〈神巫故事之一〉、〈日與夜〉、〈道師與道場〉等篇章，都專注於人類「愛欲」的書寫，但沈從文此時的創作手法出現了兩個面向的突破，一是將「愛欲」與鄉土人物、風俗描寫結合起來，如〈參軍〉和〈道師與道場〉；二是以重建苗族傳說故事的模式歌詠愛情並寄寓情欲苦悶，如〈龍朱〉、〈神巫故

²¹ 解志熙，〈愛欲書寫的「詩與真」——沈從文現代時期的文學行為敘論〉，《欲望的文學風旗——沈從文與張愛玲文學行為考論》（臺北：人間出版社，2012 年），頁 14-64。

事之一〉和〈日與夜〉。其中〈神巫故事之一〉是後來收於《神巫之愛》的〈第二天晚上的事〉，〈日與夜〉則是《神巫之愛》中〈第三天的事〉和〈第三天晚上的事〉兩篇的合併。在這兩類作品中，前者在娓娓道來的鄉土描寫中展現青春男子健康、自然、豐沛的性欲衝動，以及湘西純樸美好的人性，如〈參軍〉中的老參軍理解年輕弁兵的青春欲望，體貼地讓他去與情人約會，甚至不嫌麻煩地親自去通知弁兵軍隊不開拔的最新消息，讓他能好好地與情人「算帳」。²² 又如〈道師與道場〉的主人公雖是念經上表的道師，小說所描寫的卻不是消災祈福的水陸法會，而是人性愛欲的「道場」，師弟王貴與情人翠翠當著師兄的面吃酒調笑，就為了引誘師兄擺脫拘謹的性情，體驗人間愛欲的美好。²³ 而苗族傳說故事一類則透過龍朱、神巫和花帕族女子的愛情追求來歌詠愛情的神聖美麗，以及青春生命面對愛情時的悸動、膽怯和猶疑不安的苦悶。這兩種面向的突破，都讓沈從文的愛欲書寫有了更詩意的包裝，並發展出三〇年代成熟的鄉土作品，因此刊登在《紅黑》上的這些篇章可說具有承上啟下的關鍵性位置。

在大量的愛欲書寫之外，沈從文以「甲辰」的筆名，發表了三篇略有左翼思想的作品，分別是〈一個天才的通信〉、〈寄給某編輯先生〉和〈大城中的小事情〉。其中〈一個天才的通信〉和〈寄給某編輯先生〉可以看做連貫的姊妹篇，透過一個被文壇譽為「天才」，實則靠賣文為生，在貧病中辛苦度日的作家的「牢騷文」，道出貧苦階層對有錢階級的「仇視」，也呈現頗為鮮明的階級意識。²⁴ 這些「牢騷文」

²² 沈從文，〈參軍〉，《紅黑》第2期（1929年2月），收入《民國珍稀短刊斷刊（上海卷十一）》，頁81-89。

²³ 沈從文，〈道師與道場〉，《紅黑》第6期（1929年6月），收入《民國珍稀短刊斷刊（上海卷十一）》，頁267-282。

²⁴ 甲辰，〈一個天才的通信〉，《紅黑》第6期（1929年6月），收入《民國珍稀短刊斷刊（上海卷十一）》，頁295-311；甲辰，〈寄給某編輯先生〉，《紅黑》第7期（1929年7月），收入《民國珍稀短刊斷刊（上海卷十一）》，頁351-366。

既可看做是北京時期「生之苦悶」系列作品的延續與發展，也真實地呈現二〇年代末，沈從文在上海艱辛困窘的筆耕生活。凌宇在《沈從文傳》中曾提到沈從文在上海時已有文名，賺取的稿費是北京時期的數倍，但因上海的消費水準較高，且此時母親與九妹來上海與之同住，母親患有嚴重的肺病，九妹的學費也需籌措，因此生活負擔仍相當沉重。再加上上海的文化市場勢利而吝嗇，對作家很不友善：

雖然，一些新開張的書店，如光華、神州國光、華通等出書時都要沈從文給他們打頭炮，為得到他的書稿，正慷慨大方地贈與他「名家」、「天才」各種名頭，可是一到需要支付稿費時，卻極盡敷衍、拖欠、賴帳之能事，常常讓沈從文失望而歸。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兩年間，幾乎上海所有的書店和大型刊物都有沈從文的作品發表和集子出版，現代、新月、神州國光、北新、人間、春潮、光華、中華、華光等書店，就分別出版了沈從文的十多個作品集。可是，書出來後，沈從文卻總是不能按時得到應有的報酬，常常不得不親自上門索取，他解嘲似地稱自己為「文丐」，儘管如此，也不能每次如願。²⁵

沈從文在北京時期也寫過大量自道貧窮漂泊處境的作品，語多消沉悲哀，但在〈一個天才的通信〉和〈寄給某編輯先生〉中卻以憤激的語氣自嘲作家為出版界所宰制的命運，為困窘所迫而不得不迎合上意的悲哀，也譏諷政府與報刊媒體粉飾太平，隱含抗議之情。例如下面這段：

先生，我心上抱了歉來向你說我只能寫這點點卻要二十塊錢，承不承認自然還是在你。我決不能與你為難，這是你曉得。我一時不會死的，家中人也自然還可以延一些時間。夏天接著春

²⁵ 凌宇，《沈從文傳》（臺北：東大圖書，1991年），頁285。

天而來，秋天又在那裏等候交代，日子推遷，總不能把我變成兩樣的人。我將永遠把感謝存在心上，對你們作編輯作老板的人說那各式各樣為你們所歡喜聽的話。祇要有人願意要我的通訊，我或者一面用左手抵自己的鼻孔（引者按：敘述者因貧病長時間處在流鼻血的狀態），一面用右手能寫出很閒適蕭散的通訊。先生，你許不許可我在這裡順便提一提今天是五月三十為英國人在中國地方殺死許多中國人的一天？我是知道中國的當家人已同別人講了和，對於英國感到憤恨只應當是共產黨，而紀念也是共產黨一種人的事。可是我不過順便提一提罷了，我是很明白在中國殺死一萬人也不能算數的，中國原來不只是四萬萬人。²⁶

文中沈從文特意提到紀念「五卅慘案」一事，既有批評蔣介石的「清黨」行為背叛了以「反帝、反封建」為號召的北伐革命之意，也有抗議資本家剝削之意，同時又無奈地嘲諷中國人命之不值錢，以自傷個人卑微窘迫的處境。儘管沈從文一輩子的基本思想並不左傾，有時還有對革命略帶嘲諷的文字，但在這些自訴困窘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二〇年代後期盛行的左翼思潮如何衝擊貧苦筆耕的作家的心靈，使他在文字中閃現著左翼的階級意識。

而〈大城中的小事情〉以清黨的肅殺為背景，呈現階級與革命的複雜性。小說中的主人公是個學徒出身的鋼鐵老闆，學徒經驗使他至今仍保持著工人的生活和勞動習慣，但階級的易位也讓他學會剝削學徒和童工。在革命浪潮高漲的年代，他巧妙地利用自己的工人資格成為工會委員，工會領導的身份使他更為成功地掌控勞動者的一切行動，使之為自己所用，他再也不怕工廠中有危險份子存在。而小說中

²⁶ 甲辰，〈一個天才的通信〉，《紅黑》第6期（1929年6月），收入《民國珍稀短刊斷刊（上海卷十一）》，頁311。

的工人天真蒙昧，在革命的洗禮之下也僅僅學會了「打倒」的詞彙，並未真正的啟蒙覺醒。「工人起義」這樣的概念在上海這座大城市裡只是一個「小事情」，在一陣騷亂之後，投機的權力者成功地掌握工會，剝削的階級結構卻依然沒有任何改變。²⁷

沈從文在〈一個天才的通信〉和〈寄給某編輯先生〉中以個人經驗來呈現鮮明的階級意識，〈大城中的小事情〉則透過清黨之後上海的工人現狀來呈現階級的複雜與革命的艱難。這些作品的產生都與二〇年代末期沈從文的「上海經驗」有關。上海以資本運作為核心的文化市場加深了一個剛在文壇立足的青年作家的社會邊緣感：「一些人買書，一些人賺錢，另一些人在旁邊肚中空虛（引者按：指包括自己在內的作者），這所謂新文學運動擴張，意思就是把這關係更顯明的繼續維持而已。」²⁸ 他自稱「文丐」，甚至連索要稿費都不敢，這樣的生存處境使他感到自己與城市工人等無產階級無異（儘管他也批評工廠工人的骯髒蠢笨）。與此同時，作為「革命文學論戰」中心的上海，也讓沈從文熟悉左翼革命理論的基本語彙和概念。因此他在二〇年代末期的作品中初步展現的階級意識，與其說他由此形成新的社會觀，不如說是他借用左翼概念來抒發個人的不平之氣。也因此這些具有左翼色彩的社會認識在沈從文的生命中並沒有繼續深化的機會，在《紅黑》停刊之後，沈從文接受胡適（1891-1962）延攬，到上海中國公學任教，並從此逐步走上他心之所向，如他的貴人徐志摩（1897-1931）、胡適般的學者紳士之路，在思想上與丁玲、胡也頻分道揚鑣。²⁹

²⁷ 甲辰，〈大城中的小事情〉，《紅黑》第8期（1929年8月），收入《民國珍稀短刊斷刊（上海卷十一）》，頁407-412。

²⁸ 甲辰，〈一個天才的通信〉，《紅黑》第6期（1929年6月），收入《民國珍稀短刊斷刊（上海卷十一）》，頁307。

²⁹ 王曉明在〈沈從文：「鄉下人」的文體與「土紳士」的理想〉一文中曾詳細分析沈從文特殊的文體之形成與其生命經驗、人生世俗理想之間的辯證關係。見王曉明，《潛流與漩渦——論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家的創作心理障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頁

小說之外，沈從文還以「岳真」為筆名，發表了〈錢杏村批評之批評〉一文，直接回應 1928 年的革命文學論戰。³⁰ 錢杏村（1900-1977）是革命文學論戰中太陽社的戰將之一，沈從文的這篇文章展現他對於文學的基本立場。他強調文學獨立於政治或意識型態的價值，反對文學為政治或革命服務：「把在文學形式以及思想上革命的，牽入政治形態影響上去，因此文學的功效等於政治的目標，而文學所完成的彷彿還是一種幫助或擁護政治的方向，把文學這樣看有點怪。」³¹「除了相信眼前在進行一種運動是永遠的真理的人，其餘似乎都應把文學完成的意義放遠一點。」³¹ 並且批評許多宣揚革命文學的「同道者」是「假裝志士假充熱情」，同時批評錢杏村對文學的評價過於簡單粗暴，似乎相信「在據說極右的雜誌中發表的作品便是落伍東西，而新興的有色的雜誌總可無條件的說他極好，所登載的作品也全是革命鉅著。」³² 這樣的論點在當時會被視為革命或革命文學的對立面，但維護並強調了文學的獨立性。在二〇年代末期這個文學與革命思想激烈交鋒的時代，《紅黑》青年一面懷抱著對於社會風潮與問題的高度敏感，但也與紛至沓來的革命言論與文學流派保持距離，沈從文在回憶創辦《紅黑》時的心情便曾說道：「我們是除了低頭寫作，什麼意見也沒有的。在亂糟糟的熱鬧空氣裡，鎮靜並不從我們身邊離開。」³³《紅黑》展現了這些文學青年在對文學與社會改革抱持著素

108-132。

³⁰ 本文並未收入作品收集最為完整的《沈從文全集》，但日本學者倉重拓在〈對沈從文佚文《錢杏村批評之批評》的考證〉一文中，從沈從文的習慣用語、文章的歷史背景及相關人物的回應，如錢杏村看到此文後的回應文〈致岳真先生的一封公開信〉等等，考證此文為沈從文所作。〔日〕倉重拓，〈對沈從文佚文《錢杏村批評之批評》的考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 年第 7 期，頁 120-124。

³¹ 岳真，〈錢杏村批評之批評〉，《紅黑》第 2 期（1929 年 2 月），收入《民國珍稀短刊斷刊（上海卷十一）》，頁 116。

³² 岳真，〈錢杏村批評之批評〉，頁 118。

³³ 沈從文，〈記胡也頻〉，《沈從文全集（傳記）》，卷 13，頁 31。

樸熱情與開放態度的同時，也擁有冷靜的主見。

（二）胡也頻：從社會關懷到走向革命的左傾軌跡

《紅黑》青年中，胡也頻的文名不及沈從文和丁玲，但他卻是《紅黑》最重要的推手和執行者，幾乎包辦了《紅黑》編輯中最吃重的工作，沈從文曾回憶道：

從編輯到同印刷所去跑路，差不多全是這海軍學生（引者按：指胡也頻）辦理。他又去送稿，去算帳，去購買紙張同接洽書店，直到刊物印出時，我才來同丁玲把刊物分派到各處，清理那些數目，或者付郵到外埠去，或者親自送到四馬路各書鋪去。³⁴

丁玲也有同樣的回憶，並進一步描述胡也頻的性格與氣質：

也頻沒有讀書人的秀才架子。和工人談工作，和商人談生意，他都無所謂，無所怕。要動手幫忙，就捲起袖子幹。他曾是一個金鋪學徒，有勞動人民的氣質。³⁵

胡也頻可以說是《紅黑》的靈魂人物，他不但總理編輯、出版的所有實務工作，包括刊物「釋名」、「編後附記」等文均出自他之手，也在《紅黑》中發表大量的詩歌與小說。

胡也頻在《紅黑》中發表的詩歌，最具有浪漫熱情的青春氣息。這些詩作大多藉由對「力」的歌詠與讚嘆，來展現青年知識份子的青春血性與正義感，以及企圖改變黑暗現實的願望；而「力」的形象同時包含年輕人蓬勃昂揚的生命力與反抗黑暗的戰鬥力，以及惡勢力的

³⁴ 沈從文，〈記胡也頻〉，《沈從文全集（傳記）》，卷13，頁30。

³⁵ 丁玲，〈胡也頻〉，收入張炯主編，《丁玲全集》，卷6，頁95。

凶猛狂暴等正、反兩個面向。在〈生命的象徵〉中，胡也頻以「火種」作為生命之象徵，其「萌芽，伸展」可成為「燦爛之朝陽」，能夠「化黑暗為光明」，儘管生命由火熱至熄滅，「如既散之煙，無人見其痕跡」，但全詩以樂觀明朗的態度面對生命的自然開展與生滅，頗有郭沫若早期詩作青春自信的風格。³⁶ 在展現「力」的強勁破壞之勢時，胡也頻特別喜歡「狂風」的意象，如在〈長風曲〉中，詩人驚嘆強風的摧枯拉朽，視其為「空間之霸主」；³⁷ 在〈風聲〉中則進一步以風聲來形容「叛軍的擾亂」、「敗潰之軍旅」和「歹人來劫舍」，將風聲之淒厲恐怖與現實社會中使百姓聞之戰慄的災厄結合起來，展現詩人對平凡百姓生活苦境的哀憐。³⁸ 此外，〈生計〉悲憫下層階級貧窮顛沛的命運，³⁹ 〈初醒〉和〈噩夢〉則分別利用初醒朦朧之際回想睡夢中對專制者的戰鬥，以及被海潮荇藻襲捲網綁於海底的惡夢，來呈現知識青年在革命挫敗之際對現實的不滿與反抗、掙扎與搏鬥。⁴⁰ 這些詩篇特別呼應刊物「紅黑」所蘊含的「血與鐵」的豐富意象。

而在小說方面，胡也頻在《紅黑》時期的作品則具有更鮮明的社會意識。胡也頻早年在北平時期的小說，大多以個人經歷為素材，描寫五四一代在北平流浪的知識份子貧窮漂泊的處境，這類作品包括〈無題〉、〈漂泊的紀錄〉、〈楊修〉、〈詩稿〉、〈北風裡〉、〈往何處去〉、

³⁶ 胡也頻，〈生命的象徵〉，《紅黑》第4期（1929年4月），收入《民國珍稀短刊斷刊（上海卷十一）》，頁181-182。

³⁷ 胡也頻，〈長風曲〉，《紅黑》第8期（1929年8月），收入《民國珍稀短刊斷刊（上海卷十一）》，頁393-394。

³⁸ 胡也頻，〈風聲〉，《紅黑》第4期（1929年4月），收入《民國珍稀短刊斷刊（上海卷十一）》，頁195-196。

³⁹ 胡也頻，〈生計〉，《紅黑》第1期（1929年1月），收入《民國珍稀短刊斷刊（上海卷十一）》，頁37-38。

⁴⁰ 胡也頻，〈初醒〉，《紅黑》第3期（1929年3月），收入《民國珍稀短刊斷刊（上海卷十一）》，頁153-154；〈噩夢〉，《紅黑》第6期（1929年6月），收入《民國珍稀短刊斷刊（上海卷十一）》，頁313-314。

〈一群朋友〉、〈美的戲劇〉等篇章。⁴¹ 而在《紅黑》中的小說，則清楚地呈現胡也頻的左傾軌跡。他在第一、二期中先後發表了〈子敏先生的功課〉、〈便宜貨〉和〈一個村子〉等三篇小說，這三篇小說批判有錢階級的享樂生活和軍閥亂政給百姓帶來的痛苦，流露出最質樸的社會關懷與階級意識。〈子敏先生的功課〉以嘲諷的口吻描述時髦人物的荒唐佚樂與虛情假意。主人公子敏先生為了不讓妻子前來上海與之同住，妨礙他夜夜笙歌，流連於舞廳、美女的享樂生活，於是答應妻子每天寫一封家書報告生活，這便是子敏先生每日的「功課」。小說展示子敏先生寫給妻子的頗為「肉麻」的「情意綿綿」的家書，但真實的情況卻是，在寫信的案頭擺滿了曾經與之歡愉的女人的照片，而信件尚未寫完，子敏先生的心早已飛到「月宮」的舞女身上。⁴² 〈便宜貨〉以一個千字左右的短篇勾勒一個不斷用低價買女人的軍需長視女人如廉價商品的惡劣行狀。⁴³ 〈一個村子〉則描寫農民們滿心期待三代以來難得的豐年，面對燦爛陽光下金黃色的田野懷想著豐收之後美好的願望，沒想到一夕之間軍閥陷落了縣城，經過血腥殘酷的屠殺之後，這個村子成了只有老太婆和嬰孩倖存的地方。胡也頻以平靜的、素描式的簡單筆法描繪農民的歡鬧期待與屠殺過後的肅殺寂靜，形成極強烈的對比。⁴⁴

像胡也頻這樣早年經歷貧窮困頓的歲月，單純熱情又富有正義感的青年，在二〇年代末期來到上海，很容易受到時代的知識氛圍影響，被左翼階級理論吸引，迅速地轉變為一個堅定忠實的左翼知識份

⁴¹ 這些作品均收於胡也頻，《胡也頻選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冊上。

⁴² 胡也頻，〈子敏先生的功課〉，《紅黑》第1期（1929年1月），收入《民國珍稀短刊斷刊（上海卷十一）》，頁39-45。

⁴³ 胡也頻，〈便宜貨〉，《紅黑》第1期（1929年1月），收入《民國珍稀短刊斷刊（上海卷十一）》，頁61-63。

⁴⁴ 胡也頻，〈一個村子〉，《紅黑》第2期（1929年2月），收入《民國珍稀短刊斷刊（上海卷十一）》，頁109-114。

子。丁玲曾在胡也頻過世二十年後，在五〇年代寫下〈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記胡也頻〉一文，在這篇文章中回顧胡也頻的性格特質及左傾過程：

由於我的出身、教育、生活經歷，看得出我們的思想、性格、感情都不一樣，但他的勇敢、熱烈、執拗、樂觀和窮困都驚異了我，雖說我還覺得他有些簡單，有些蒙昧，有些稚嫩，但卻是有少有的「人」，有著最完美的品質的人。⁴⁵

也頻有一點基本上與沈從文和我是不同的。就是他不像我是一個愛幻想的人，他是一個喜歡實際行動的人；不像沈從文是一個常處於動搖的人，……也頻卻是一個堅定的人。他還不了解革命的時候，他就詛咒人生，謳歌愛情，但當他一接觸革命思想的時候，他就毫不懷疑，勤勤懇懇去了解那些他從來也沒聽到過的理論。⁴⁶

丁玲以對比的方式生動地凸顯了胡也頻的性格特質，也頗為精準地掌握了在二〇年代末期革命中挫的時代氛圍激盪之下，轉向左傾的一代小知識青年可能略顯簡單但熱情浪漫的生命特質。胡也頻在主編了兩期《紅黑》之後，更加確認了文藝在革命時代的責任和意義，因此在第三期卷首寫下了如宣言般的文字：

如同凶猛的海水擊著礁石，強硬地，堅實地生出回響的聲音，這是人間苦的全人性活動的反映，也正是一切文藝產生的動力。

為一個可悲的命運，為一種不幸的生存，為一點渺小的願望而

⁴⁵ 丁玲，〈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記胡也頻〉，收入張炯主編，《丁玲全集》，卷9，頁66。

⁴⁶ 丁玲，〈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記胡也頻〉，收入張炯主編，《丁玲全集》，卷9，頁68。

奮力爭鬥，這是文藝的真意義。

負擔著，而且深吻著苦味生活的人，才能夠勝任這文藝的使命。

地球上沒有黃金是鐵色的，所以要經歷一個黯淡人生，才充分地表現這人生的可悲事實。

文藝的產生是因為缺陷的，並且為這缺陷的人類而存在著。

要創作，必須深入地知道人間苦，從這苦味生活中訓練創作的力。

文藝的花是帶血的。⁴⁷

這段情感激昂的文字，讓人聯想到魯迅的散文詩〈一覺〉，魯迅在文中慨嘆他閱讀青年作家的書稿，感受到青年如何因時代的黑暗而「苦惱、呻吟、憤怒、粗暴」的生命熱力。⁴⁸ 這段文字閃現著革命時代為社會戰鬥與犧牲的「紅黑」意象，雖不直接贊同當時盛行，略顯簡單和教條的「革命文學」，但與「革命文學」同樣賦予文藝直視現實，並為改造生存現狀的願望而努力的使命感。

到了《紅黑》第七、八兩期，胡也頻開始連載中篇小說〈到 M 城去〉。〈到 M 城去〉後改名《到莫斯科去》，明確標示「M 城」之意象，從題名即可見作家鮮明的左翼意識。同時，胡也頻以「白丁」為筆名發表這篇小說，也刻意彰顯階級位置。這個中篇和寫於 1930 年的《光明在我們的面前》是胡也頻描述知識份子思想轉變，走向革命的代表作。丁玲在小說連載之際，在《紅黑》上刊登了〈介紹「到 M 城去」〉一文，文中提到：

⁴⁷ 此文刊於《紅黑》第 3 期（1929 年 3 月）目錄之後，收入《民國珍稀短刊斷刊（上海卷十一）》，無頁碼。

⁴⁸ 魯迅，〈一覺〉，《野草》，《魯迅全集》，卷 2，頁 223-224。

「到 M 城去」——只要知道這 M 城是一個什麼地方，就可以想見這一篇小說的思想所集中的焦點了。全篇是以現革命成功之後的一部分政局為背景，而寫出厭惡於新貴族生活，終於用堅強的意志而離開那環境，毅然走向 M 城去的一個新女性。……這些人物，從其中，我們可以看見到現今中國人物的各種典型，而且使我們預料著這一個正在大變動的時代，那最後，該應是一種怎樣的傾向。⁴⁹

丁玲的介紹清晰地留下了時代氛圍與胡也頻思想左傾的痕跡。

這篇小說描寫聰明美麗、情感熱烈而富有生命力的女主人公素裳女士受到革命者施洵白的吸引和影響，開始閱讀唯物主義思想的書籍，並認識社會階級差異的嚴酷，最終決定拋棄她作為黨國要人的丈夫徐大齊和浮華的少奶奶生活，走上革命的道路。由於《紅黑》出刊八期之後停刊，因此這部小說僅刊載了前六節，在前六節中，較為集中地描寫素裳女士面對自己富貴、時髦但貧乏的生活所感受的苦悶：

「我應該有一點工作，無論什麼工作都行。」

然而她一想到婦女在這社會中的生活地位（引者按：應為「地位」），便不得不承認幾乎是全部的女人還靠著男人而度過了一生的。並且就是在托福於「三民主義」的革命成功中，所謂婦女運動得了優越的結果，也不過在許多官僚中添上女官僚罷了。或者在男同志中選上一個很好的丈夫便放棄了一切工作。似乎女人全不想這社會的各種責任，是也應該負在自己的肩上，至少不要由男人的領導而幹著婦女運動的。⁵⁰

⁴⁹ 丁玲，〈介紹「到 M 城去」〉，《紅黑》第 7 期（1929 年 7 月），收入《民國珍稀短刊斷刊（上海卷十一）》，頁 320。引文黑線為引者所加。

⁵⁰ 胡也頻，〈到 M 城去〉，《紅黑》第 7 期（1929 年 7 月），收入《民國珍稀短刊斷刊（上海卷

素裳女士對於依附丈夫的生活感到不滿足，渴望建立女性自身的主體性與價值感，這個特點與丁玲早期作品中的女性困境相互呼應。同時，前六節也對比徐大齊的客廳和素裳女士書房兩個空間，前者聚集了高談闊論、善於辭令的官僚，流動著追逐名利和女人的欲望；後者則充滿書香，安靜嫺雅，透過素裳女士與施洵白對於蘇俄現代文壇與文學作品的討論，呈現素裳女士旺盛的求知欲及其對精神性富足的渴求，為素裳女士後來走向左翼的生命抉擇進行情節的鋪墊。

以小說發展主軸來看，〈到 M 城去〉也呼應國民革命失敗後興起的「革命＋戀愛」小說。如果說「啟蒙」是五四時期文學最重要的核心精神，「愛情」則是承載和表達啟蒙與個人解放精神最重要的文學主題，此時的「愛情」本身就具有革命性。但隨著二〇年代後期「革命文學」與「無產階級文學」的倡導和發展，「愛情」的革命性被「革命」本身取代，「愛情」與「革命」的張力也成為「個人」與「集體」選擇的一種代名詞。⁵¹ 而二〇年代末期大量出現的「革命＋戀愛」小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發展的脈絡中，也可視為五四文學到三〇年代左翼文學的轉折與過渡。「革命文學論爭」中太陽社的主將蔣光慈（1901-1931）是最早集中書寫「革命＋戀愛」主題的作家，他在二〇年代末期先後發表了《野祭》（1927）、《菊芬》（1928）和《衝出雲圍的月亮》（1930），形成「革命＋戀愛」小說中的「蔣光慈模式」：「革命決定或產生戀愛」。⁵² 而胡也頻的〈到 M 城去〉也可以被歸入「蔣

十一）》，頁 334。

⁵¹ 有關中國二十世紀文學中「革命與愛情」論題的分析，可參考〔美〕劉劍梅著，郭冰茹譯，《革命與情愛——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中的女性身體與主題重述》（上海：三聯書店，2009 年）；林華瑜，《「革命與愛情」的現代性敘事圖景——中國現代小說的題材敘事研究》（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 年）等書。

⁵² 1933 年，茅盾回顧二〇年代末期興起的「革命＋戀愛」小說，曾根據左翼文學的發展路徑，將這類小說大致概括為三個進程：戀愛與革命的衝突、革命決定了戀愛、革命產生了戀愛，最後「革命」取代了「戀愛」，成為三〇年代左翼文學的核心精神。茅盾，〈「革命」與「戀

光慈模式」的「革命＋戀愛」小說。

此外，〈到 M 城去〉的開頭，作家也透過素裳的生日宴會中，知識份子的交誼閒聊頗真實地反映上海最時髦的戀愛觀：對柯倫泰（1872-1952）「三代戀愛」的討論。日本學者秋山洋子曾在〈柯倫泰的戀愛觀及其影響——丁玲早期創作的背景之一〉一文中，論析俄國社會主義女革命家亞歷山德拉·柯倫泰創作的「戀愛三部曲」之一〈三代的戀愛〉如何重新思考革命時代新社會中的性與愛情，並爬梳柯倫泰的〈三代的戀愛〉經由夏衍（1900-1995）、楊騷（1900-1957）、周揚（1908-1989）等作家的翻譯，從日本傳入中國，在 1928 年《新女性》雜誌的「新戀愛問題」專集中所引發熱烈的爭論。在柯倫泰〈三代的戀愛〉中，第一代的「祖母」是舊俄時期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主張自由戀愛，並堅守一夫一妻制；第二代的「母親」從事地下革命工作，她周旋在「革命同志、丈夫」與「情人」之間左右為難；第三代的「女兒」忙於革命運動，隨心所欲，沒有固定的性伴侶。⁵³ 在胡也頻的小說中，素裳的女客們通過科倫泰〈三代的戀愛〉談論著「性的完全解放」，素裳甚至調侃地回應她的朋友：「也許你已經做過第四代的——所以科倫泰的三代戀愛在你是不成問題了。」⁵⁴ 由此可見，「革命＋戀愛」時期的「戀愛」內涵，也與五四時期截然不同。五四時期的「戀愛」是反封建的堡壘，是個性解放的象徵，而到了二〇年

愛」的公式》，《茅盾全集（中國文論三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 年），卷 20，頁 339。而賀桂梅則從戀愛與革命的關係，將茅盾的三個進程簡化為兩大類：一類是「蔣光慈模式」——戀愛與革命的兼容，一類是「丁玲模式」——戀愛與革命的衝突。賀桂梅，〈性／政治的轉換與張力——早期普羅小說中「革命＋戀愛」模式解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 年第 5 期，頁 69-92。

⁵³ 〔日〕秋山洋子，〈柯倫泰的戀愛觀及其影響——丁玲早期創作的背景之一〉，收入秋山洋子、江上幸子、前山加奈子、田畑佐和子，《探索丁玲——日本女性研究者論集》（臺北：人間出版社，2017 年），頁 53-67。

⁵⁴ 胡也頻，〈到 M 城去〉，《紅黑》第 7 期（1929 年 7 月），收入《民國珍稀短刊斷刊（上海卷十一）》，頁 323。

代末期的上海，「戀愛」則交融著個體自身情感、欲望與性的糾葛，並與革命、解放、自由、時尚等社會氛圍和思潮形成複雜的關係。

整體來說，在《紅黑》時期，胡也頻的詩歌偏重抒發個人熱烈勃發的情志和生命力，小說則展現作家的社會關懷與左傾思想軌跡。此外，胡也頻還發表了兩篇比較特殊的小說，分別是〈三個不統一的人物〉和〈苦刑〉，這兩篇小說都沒有收入福建人民出版社於1981年出版的《胡也頻選集》。這兩篇作品坦率地傾吐作家面對三角戀情的痛苦，頗為清楚地指涉胡也頻遭遇丁玲被共產黨員馮雪峰（1903-1976）所吸引而產生傾慕之情時，內心的不安、苦悶與煎熬。〈苦刑〉描述男主人公被愛情中的猜疑、嫉妒與怨憤深深折磨，唯恐身邊的「她」移情別戀；⁵⁵〈三個不統一的人物〉則藉由「旋玻」、「飄蘋」、「琳」三人相互往來的書信，綴連成交錯的情感糾葛，主人公的名字便是「雪峰」、「也頻」和「玲」的諧音。⁵⁶但胡也頻也許有意避人耳目，將「旋玻」與「飄蘋」的身份位置與情感狀態對調。在《紅黑》發刊的1929年，丁玲和馮雪峰已經沒有往來，胡也頻頗為設身處地地設想1927年底至1928年間三人陷入情感糾葛中的心情。在〈三個不統一的人物〉中，三個青年都是熱烈而真摯的人，陷落在「友情」與「愛情」的痛苦掙扎中不知如何自處。現有的資料大多是丁玲對於胡也頻和馮雪峰兩人的情感敘述，這兩篇作品則填補了胡也頻的視角，陳述他在面對愛情時的疑慮、痛苦和傷心，也展現作家的熱情與率真，滿溢著蓬勃的青春氣息，是紀錄這段涉及三位作家感情狀態的珍貴材料。而這兩篇小說中的情感狀態也能與科倫泰〈三代的戀愛〉相互對照，呈現二〇年代末期青年知識份子的戀愛關係。

⁵⁵ 胡也頻，〈苦刑〉，《紅黑》第4期（1929年4月），收入《民國珍稀短刊斷刊（上海卷十一）》，頁167-180。

⁵⁶ 胡也頻，〈三個不統一的人物〉，《紅黑》第3期（1929年3月），收入《民國珍稀短刊斷刊（上海卷十一）》，頁135-151。

（三）丁玲：女性主體價值的追求與確立

丁玲於 1927 年底至 1928 年七月間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了〈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暑假中〉、〈阿毛姑娘〉等四篇小說，在文壇上大放異彩，並在 1928 年十月將四篇小說結集成書出版，書名題為《在黑暗中》。⁵⁷「在黑暗中」是丁玲對於五四之後包括自己在內的「新女性」之生命處境的描述：她們是出走的娜拉，在勇敢走出家門之後，面對的是茫茫前途，以及現代化進程中由各種欲望、誘惑與陷阱交織而成如網羅般的社會。1929 年起，丁玲在《紅黑》中發表了五篇小說，除〈過年〉一篇外，其他篇章都與描寫女性生命處境和思考女性主體價值的建立等議題有關，可以說是《在黑暗中》的擴大和延伸。其進展之處，在於這些篇章不再僅僅是描寫女性「在黑暗中」的處境，更進一步思考女性主體價值建立之可能性。其中，〈慶雲里中的一間小房裡〉可與〈阿毛姑娘〉相互對照；〈小火輪上〉可與〈暑假中〉相互對照；〈日〉可與〈莎菲女士的日記〉相互對照。這些作品都與生命欲望有關，其中包含著青春愛情的欲望、物質享受的欲望以及實現生命價值的欲望等等所有「人」的生之欲望，並以女性主體凸顯獨特的女性困境。

《在黑暗中》的〈阿毛姑娘〉描寫嫁到西湖邊上富裕農家的山村姑娘對繁華的杭州城的嚮往，這是描述現代城市生活的物質享受對女性的誘惑；〈慶雲里中的一間小房裡〉中的阿英則是從鄉下來到上海謀生的妓女，描述一個靠自己的身體養活自己的女人如何平靜地面對自我內心的欲望。〈慶雲里中的一間小房裡〉比〈阿毛姑娘〉更為客觀和寬廣地開展了城鄉的空間對照與社會現實，也展現了阿英自我的主體選擇，這使得阿英的生命即使充滿無奈，卻不像阿毛姑娘那樣陷

⁵⁷ 王增如、李向東編著，《丁玲年譜長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年），卷上，頁 36-39。

入虛無的絕望中，而更具有對自我生命選擇的承擔。小說中，阿英夢見她帶著從城裡賺來的錢回到鄉下，和自己所喜歡的、老實粗壯的種田人陳老三安安靜靜地在家鄉過完一生，她夢見陳老三帶給她快樂歡愉的情欲滿足，而這美妙的夢境被現實中阿姆的叫罵聲所替代。從夢中醒來，回到現實，現實中的陳老三因軍閥長年戰亂，農村凋蔽，無法靠種田養活老婆，當然更不可能替她贖身。在「夢想」與「現實」、「城」與「鄉」、「妻子」與「妓女」、「物質欲望的滿足」與「家庭幸福」等多重欲望與矛盾的交錯掙扎中，美好的夢境逐漸遠離她的意識：

早上的夢，她全忘了。那於她無益。她為什麼定要嫁人呢？說吃飯穿衣，她現在並不愁什麼，一切都由阿姆負擔了。說缺少一個丈夫，然而她夜夜並不虛過呀！而且這只有更能覺得有趣的……她什麼事都可以不做，除了去陪男人睡，但這事並不難，她很慣於這個了。她不會害羞，當她陪著笑臉去拉每位不認識的人時。她現在是顛倒怕過她從前曾有過，又曾渴望過的一個安分的婦人的生活。⁵⁸

妓女生活的選擇使阿英的情欲、物欲和主體自由獲得了滿足，阿英對主體欲望的認識與選擇可以說建立了女性的某種主體性，但丁玲思考的複雜與深刻之處在於，她也看到了這種選擇背後的社會問題，她為小說設計了這樣的結尾：在小說最末，阿英與姊妹們在相互嬉鬧調笑的氣氛中在街頭招攬客人，這個場景透露著難以明言的悲哀。真實的情形是，阿英寧可在街頭吹風，也無法獨自在房裡聽著隔壁大姊和有意為她贖身的客人所發出幸福歡愉的恩愛聲響，因此即使找不到能出五元的客人，就是三元或兩元的也成。阿英想要擁有家庭幸福的欲望無法獲得滿足，以及為了生存不得不自貶身價的悲哀，都是阿英的選

⁵⁸ 丁玲，〈慶雲里中的一間小房裡〉，《紅黑》第1期（1929年1月），收入《民國珍稀短刊斷刊（上海卷十一）》，頁57-58。

擇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丁玲透過慶雲里一個小房間裡的妓女對生命的選擇，開展出在農村凋蔽的社會現實中，以及城市資本主義以「金錢」為核心的運作規則兩方面的夾擊之下，農村女性進退維谷的窘境。

〈慶雲里中的一間小房裡〉描述的是未受教育的農村女性的生命困境，〈小火輪上〉的主人公則是接受五四運動與新式教育洗禮的新女性。〈小火輪上〉與收錄在《在黑暗中》的〈暑假中〉同樣以湖南家鄉桃源、武陵一帶為背景，透過女教師的角色寫出新式知識女性在「愛情」和「事業」所面對的困境。〈暑假中〉的女教師們猶帶著少女的爭風吃醋與吵嚷喧鬧，〈小火輪上〉的節大姊則呈現獨身的新女性在愛情與事業雙重失落後的漂泊無依之感。「愛情」與「事業」可以說是五四之後的新女性在建立自我主體價值時的兩大核心問題，前者代表個人情感與欲望的滿足，後者代表社會身份與生命價值的確立。主人公節大姊對愛情與教書工作同樣滿懷美麗的憧憬，面對愛情的萌生，她懷抱著為愛情忠誠地奉獻的心願：「她很願她是不僅屬於自己，而是屬於別一人的就好。」⁵⁹ 在教書工作上，她也認真盡責，深受學生的喜愛。然而她卻因與崑山的戀愛而被學校惡意地辭退，戀愛也因崑山的欺瞞而終結。隨著小火輪抵達武陵，她呆楞著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將往何處去。這篇小說呈現新式女性知識份子面對愛情與工作的雙重風險，實現生命價值的欲望因艱難的現實而遭到挫敗，同時也呈現社會觀念對女性欲望的壓抑：女性的愛情與婚姻總是被他人關注和議論的課題，並進而成為剝奪女性工作權益的藉口。

〈日〉中的伊賽則可說是「莎菲」的孿生姊妹，和莎菲一樣對生命感到無聊苦悶，但由於丁玲採用不同的寫法，小說因此開展出完全不同的視野。在〈莎菲女士的日記〉中，丁玲採用第一人稱的日記體，

⁵⁹ 丁玲，〈小火輪上〉，《紅黑》第3期（1929年3月），收入《民國珍稀短刊斷刊（上海卷十一）》，頁100。

進行深度的內心挖掘和剖析，呈現莎菲反覆辯證的心靈狀態，而到了〈日〉中，丁玲採取宏觀、俯視的敘述角度，透過一整天從白日到黑夜的時序循環，先整體描述上海這座由「許多國家，許多人種所共同管轄，共同生活」⁶⁰的半殖民都市，再聚焦到伊賽日復一日、百無聊賴的日常生活，丁玲對伊賽的生活描述因此突破了「女性困境」的主題，從而展現現代城市生活的「異化」現象。小說前兩大段對於上海全景式的描述，展現了不同於〈莎菲女士的日記〉的階級意識，也展現丁玲對於上海市景、市聲細膩深刻的觀察和傳神的描繪。丁玲從高處俯視大樓內雅致的房間裡，盡是杯盤狼藉、軟枕四散、軀體橫陳，夜夜笙歌後的慵懶與頹廢；而在林立的高樓與工廠煙囪的陰影遮掩下，幽暗曲折的小巷內擁擠著破亂頹敗的小屋，徘徊著困倦而飢餓的下層妓女，聚集著因過勞而麻木、骯髒而瘦弱的勞動者，兩個場景輪廓式地對比出上海嚴重的貧富差距，而這種階級對比的手法也成為三〇年代左翼小說在全景式地描寫上海時的重要特色。二〇年代初來到上海求學時的丁玲年紀尚輕，她在廣闊自由的大世界裡尋找自我立足的方法，從上海到北京，她最初的作品都在抒發作為新女性的生命苦悶。二〇年代末期再度來到上海，上海給予丁玲的刺激則包括社會視野的開拓和階級革命思潮的衝擊，讓丁玲的文學視野由個人擴展到整體社會。因此儘管〈日〉仍展現丁玲對於女性生命困境的思考，但上海嚴峻的社會問題，也讓丁玲的小說敘述風格從〈莎菲〉的狂熱騷亂中抽離出來，轉為客觀冷靜。

〈慶雲里中的一間小房裡〉、〈小火輪上〉和〈日〉等作品從不同角度展現不同階級的女性各個層面的生之欲望，她們濃烈豐沛的生之欲望與現實社會的衝突、衝撞，從另一個面向表現了「紅黑」的色彩

⁶⁰ 丁玲，〈日〉，《紅黑》第5期（1929年5月），收入《民國珍稀短刊斷刊（上海卷十一）》，頁217。

意象。而將丁玲《紅黑》時期的作品與《在黑暗中》相比，則可看出丁玲更清晰、冷靜地認識、反省女性作為一個「人」的生命欲望與價值認同，不再僅止於呈現女性的苦悶，而企圖追尋並建立女性的主體價值，因此她的敘述風格逐漸趨向平靜客觀，也在對社會結構的整體認識中重新反省女性所遭遇的生命課題。

如果說上述三篇小說上承《在黑暗中》的主題並加以擴大，〈過年〉和〈野草〉這兩篇作品則可以說是「啟下」的轉折性作品。從〈夢珂〉開始，丁玲一直「向前看」，著力於描述和思考女性主體價值的實踐之路，不曾回顧過去。直到1929年發表的〈過年〉，丁玲才以「女童」的視角書寫自己的童年經驗。這篇小說以近似散文的抒情筆法，描述童年時期，母親帶著年幼的弟弟在外謀生，自己獨自寄居舅舅家的寂寞歲月，以母親回家過年團圓的幸福感，對照母親回家前和即將離家的落寞感，整篇作品既滿溢著故鄉過年時節濃厚的生活情味、對母親的孺慕之情、姊弟之間的友愛，以及母親期待她成長和堅強的願望，同時又帶著孤女的寂寞憂傷，是很動人的一篇佳作。⁶¹這篇作品可以看做是丁玲三〇年代長篇小說《母親》的前導作品，而丁玲的《母親》，則為丁玲文學創作中最重要的主題之一：書寫各式各樣的女性生命經驗及其困境，添上豐富鮮活的一例。

而〈野草〉這篇作品開始擺脫莎菲時期的苦悶，小說中的女主人公「野草」也曾經沉浸在戀愛的歡愉與刺激中，但如今她對南俠的熱烈追求卻毫不動心，儘管過往的情愛經驗仍讓她感到迷醉，但相較於愛情的虛幻易逝，「寫作」則讓她的生命穩定下來。她為她的小說人物思索著、煩惱著，但這煩惱卻讓生命有了充實篤定之感，同時她也透過書寫，更為客觀地反省女性性格的弱點。小說最終，她拒絕了南

⁶¹ 丁玲，〈過年〉，《紅黑》第2期（1929年2月），收入《民國珍稀短刊斷刊（上海卷十一）》，頁67-80。

俠約會的再次邀請，她想專注於自己的寫作，並為自己的作品感到快樂。⁶² 野草面對寫作時的心情，可以說是丁玲的自我寫照，而〈野草〉這篇作品也宣告「莎菲時代」的結束，丁玲透過「寫作」找到了女性主體價值的實踐方法，並確立了生命的第一個志業。

在〈野草〉之後，丁玲在 1929 年冬天，以好友王劍虹（1901-1924）和共產黨員瞿秋白（1899-1935）的情感經歷為素材，寫出了中篇小說《韋護》。這篇小說與 1930 年創作的〈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之二）〉，向來被視為丁玲「革命＋戀愛」主題的小說，而這些篇章也意味著丁玲的創作進入了另一個階段：「革命」元素的正式加入。將胡也頻與丁玲對比，則可以看到兩人的差異：胡也頻具有詩人浪漫熱情的性格，在革命思潮的洗禮下，懷抱著社會使命感的他義無反顧地加入左翼陣營，相較之下，丁玲更為冷靜複雜，她以女性主體的建立作為思考主軸，將革命與主體價值建立之間的關係進行辯證性的複雜思考，因此她作品中的「戀愛」與「革命」也有更多的抵抗和衝突，而「戀愛」與「革命」的衝突，則可視作作家對「五四精神」與「左翼革命思想」的猶疑與拉扯。

四、縱的繼承與外國文學的譯介

《紅黑》中最重要的創作主體是編輯群沈從文、胡也頻和丁玲等三人，但在三人的創作之外，從其他作品中也可看見轉折時期的文學發展軌跡。

在《紅黑》第一期中，沈、胡、丁三人包辦了整期的作品，唯一的例外是桂山的〈李太太的頭髮〉。桂山是五四時期文學研究會的重

⁶² 丁玲，〈野草〉，《紅黑》第 6 期（1929 年 6 月），收入《民國珍稀短刊斷刊（上海卷十一）》，頁 285-293。

要作家葉聖陶。葉聖陶是丁玲的文學貴人，在他的慧眼賞識下，他將丁玲的〈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暑假中〉、〈阿毛姑娘〉等作品刊登在全國知名的文學刊物《小說月報》上。丁玲曾在〈答《開卷》記者問〉中提到葉聖陶將她的四篇小說發為《小說月報》的頭條，讓她「一出台就掛頭牌」，幸運地成為文壇新星。⁶³ 1928年丁玲一到上海之後，便去景雲里拜訪葉聖陶，厚待晚輩的葉聖陶更提出由開明書店出版丁玲第一本小說集《在黑暗中》的建議。⁶⁴ 中共建國初期，丁玲的秘書張鳳珠曾說：「丁玲一生最感念的，在文藝界是葉聖陶，在黨內是任弼時。」⁶⁵

《紅黑》籌備時，可能是丁玲等人向文學前輩邀稿，也可能是葉聖陶得知年輕人籌辦刊物主動贊助，因此在第一期中便出現葉聖陶的〈李太太的頭髮〉。這篇作品透過當校長的李太太對於北伐革命時期剪不剪髮的猶疑，呈現動盪時代中小人物的狼狽難堪、進退失據，可以和葉聖陶的另一篇作品〈潘先生在難中〉合觀。同時，這篇作品也和魯迅的〈風波〉、〈頭髮的故事〉等作品相互呼應，不同之處在於魯迅的作品以辛亥革命為背景，寫男性的頭髮問題，葉聖陶的作品則以二〇年代北伐革命為背景，寫女性的剪髮問題，時空的差距可見時代的進程與婦女解放的遲緩和艱難之處。葉聖陶的作品總是體貼小人物面對混亂時代的無力感，也對老百姓目光短淺、膽怯溫儒的性格進行輕微的嘲諷，但他所想批判的，仍是讓老百姓居無定所、舉措不安的時局，展現文學與現實緊密的連結關係。以葉聖陶的小說作為發刊首期的第一篇作品，既有打響刊物名號的用意，也暗示《紅黑》青年對

⁶³ 丁玲，〈答《開卷》記者問〉，收入張炯主編，《丁玲全集》，卷8，頁3。

⁶⁴ 李向東、王增如，《丁玲傳》，冊上，頁59-60。

⁶⁵ 李向東、王增如，《丁玲傳》，冊上，頁227-228。四〇年代共產黨對丁玲南京時期的歷史問題進行調查時，任弼時（1904-1950）出面負責對丁玲的審查，任弼時爽朗開放的調查態度及做出的結論，展現出對同志的信任和體貼，因此丁玲感恩任弼時的照顧。

於五四文學精神的繼承：在精進文學藝術性的同時，強調文學的社會關懷與責任。

此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葉聖陶所代表的文壇位置。在 1928 年的革命文學論爭中，論戰的兩方是包括郭沫若、馮乃超（1901-1983）、李初梨（1900-1994）、朱鏡我（1901-1941）、蔣光慈、錢杏村等後期創造社、太陽社的「革命青年」和以魯迅、茅盾、郁達夫為代表的五四文學前輩，前者以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理論激烈地批判後者具有「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劣根性」。由於「革命青年」的論戰砲火更為集中在魯迅及寫出《蝕》三部曲的茅盾，相較之下，葉聖陶遭遇的攻擊較少，但他仍是被點名的五四作家中的一員。在革命文學論爭方興未艾之際，葉聖陶在 1928 年一月至十一月間寫出個人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倪煥之》，以連載方式刊登在《教育雜誌》的「教育文藝」欄，並在 1929 年八月由開明書店出版單行本。⁶⁶ 小說連載到出版單行本的時間與《紅黑》的出刊時間有所重疊。而葉聖陶的《倪煥之》向來與茅盾的《蝕》三部曲並列，成為二〇年代末期革命小說中的知識份子「幻滅敘事」。⁶⁷ 1929 年五月，在日本的茅盾寫出〈讀《倪煥之》〉，從小說所表現的「時代性」盛讚本書是中國現代小說的「扛鼎」之作。同時，葉聖陶一直與以浙江「春暉中學」、「立達學園」為核心的開明書店關係密切，1930 年底，更擔任開明書店編輯。開明書店秉持著五四啟蒙精神，以嚴謹、開明的態度堅守出版及教育的社會責任，在政治光譜中屬於雖不參與革命，但不反對革命的一派。⁶⁸

從葉聖陶在二〇年代末期的文壇位置，也可以看出《紅黑》在編輯初期的傾向性：他們並不想在革命文學的論爭中攪和，對於革命也

⁶⁶ 葉聖陶，〈作者自記〉，《葉聖陶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7 年），卷 3，頁 285。

⁶⁷ 王燁，《二十世紀革命小說的敘事形式》（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42-53。

⁶⁸ 吳福輝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1928-193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23-28。

沒有鮮明的立場，只專注於文學的耕耘，並敬重五四時期關懷社會的文學前輩。儘管隨著《紅黑》的出刊，胡也頻的革命性日漸鮮明，但對文學的開放態度，也並沒有改變。同時，將葉聖陶與沈從文、胡也頻、丁玲對照來看，也可以看出歷史的進程與轉折，以及知識份子的人生選擇：葉聖陶在國民革命失敗的幻滅和痛苦中，重新審視自我面對五四精神與左翼革命運動的兩種理想，最後根據自己的心性，選擇了同情革命但不參與，以文化、教育的方式承擔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胡也頻和丁玲則在左翼思潮的衝擊激盪之下，先後進入了左翼陣營，而沈從文則走向了遠離革命的反面。

除了五四時期的文學前輩，《紅黑》中也樂於刊登尚未有名於文壇的年輕作家的作品，從第四期開始，每期都有一至兩篇新人創作，這些作家包括戴南冠（?-?）、黃丙（?-?）、江蔭（?-?）、許次寰（?-?）、劉開渠（1904-1993）、謝冰季（1910-1984）等人。這些年輕人的作品幾乎圍繞著青春愛情與社會批判等兩大主題，顯現文學青年對個人生命與社會現實的熱情、困惑和不滿，以及隨之而生的憤怒與反抗搏鬥，充分展現刊名的《紅黑》意象。其中更不乏呼應時代知識氛圍，具有鮮明左翼思想的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黃丙的詩作〈失敗的偶像〉，全詩敘述至高無上的上帝原本希望把人間的坎坷填平，讓人類平等相愛，但現實社會卻是戰亂、盜賊、飢荒、階級壓迫等重重苦難，於是祂不斷地接到來自人間的祈願、呼號與控訴：

「人類都快餓死了快拿起你們的鋤頭，
我們都曾遵著您這吩咐拼著讓血汗長流；
但當我們一個個把鋤頭拿起，
主啊，事實是這樣先餓死的卻是我們自己！」

「富豪吸盡了我們的血液，
強盜又來刮削我們的皮肉，

主啊這就是我們櫛風沐雨的結果，
犧牲了我們去餵養萬惡的人類為的什麼？」

「用貧富把人類造成了許多層階梯這是你的糊塗，
我貧窮挨冷我自然是要搶要偷！
從富豪的手中勻點兒東西來維持我的生活，
啊，不材竟因此墮入了你無情的圈套，——犯了什麼鳥的罪惡！」

「是不是我們應該沒有飯喫衣穿？
是不是我們沒有了生活的自由之權？
黑暗的牢獄你專為我們造就，
啊，你這萬惡的上帝富翁們的家奴！」

.....⁶⁹

這些作品儘管由於情緒過於憤激直露而略顯粗糙，但也展現知識青年面對社會問題時素樸的不平之氣與正義感。由於革命文學論爭的發動者後期創造社和太陽社的主要目的是企圖在文壇上創造、推動以左翼革命理論為核心的文學風潮，而兩個社群的主要刊物《創造週報》、《創造月刊》和《文化批判》都是以理論批評為主，因此整個革命文學論爭是一個以理論為主，文學文本和內涵都相對簡單和空泛的論爭。在革命文學論爭之後，左翼作家們才開始充實、豐富革命文學的血肉。因此二〇年代末期的革命文學或左翼文學，大致呈現兩個面向的缺失，一是過於強調以「正確的階級觀點」控制內容，導致意識形態先行；二是在作品中展現革命者的革命激情，即所謂的「革命的浪漫諦克」，兩者都以革命理想為書寫核心，而有脫離複雜現實的弊病。而

⁶⁹ 黃丙，〈失敗的偶像〉《紅黑》第5期（1929年5月），收入《民國珍稀短刊斷刊（上海卷十一）》，頁241-242。

在《紅黑》中發表作品的青年作家，大多受革命文學風潮才初具階級意識，他們的作品較常把階級意識融入對社會現實的感知中，表現出對黑暗現實的憤激之情。由於他們對複雜現實的認識與描寫不夠全面和深刻，作品仍然較為淺薄。然而由革命文學風潮所激盪而起的階級意識與左翼思想，在進入三〇年代之後，被鎔鑄成更具有現實感的文學作品，例如茅盾、葉紫（1910-1939）、吳祖緬（1908-1994）等人的農村破產小說，進而形成三〇年代的左翼文學主潮。從這個角度來看，《紅黑》刊登的作品也留下了承上（五四文學）啟下（三〇年代左翼文學）的轉折痕跡。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紅黑》中「唯二」的小說譯作，兩篇作品都是俄國文學，由此可見五四之後到二〇年代，俄國文學在中國文壇所受到的重視，也可見《紅黑》編輯群（特別是胡也頻）對俄羅斯與蘇聯文學的偏好，及其背後的思想形態。兩篇作品中，一篇是刊於《紅黑》第二期，阿爾志巴綏夫（Mikhail Artsybashev, 1878-1927）原著、戴望舒（1905-1950）翻譯的〈夜〉，一篇是刊於《紅黑》第五期，潘蒂里蒙·萊蒙諾夫（1884-？）原著、篷子（姚蓬子）（1905-1969）翻譯的〈黑麵包〉。阿爾志巴綏夫是俄羅斯文學「白銀時代」的重要作家之一，1905 年之後在俄國受到青年喜愛的小說家。五四時期，魯迅、胡愈之（1896-1986）、鄭振鐸（1898-1958）、沈澤民（1900-1933）等人都曾翻譯過他的作品，他在中國最廣為人知的作品，是由魯迅翻譯的《工人綏惠略夫》。⁷⁰ 他的作品以現代派的象徵手法呈現俄國社會的黑暗現實，頗能引起中國青年的共鳴。〈夜〉這篇小說描寫一個青年醫生在值班的夜晚胡思亂想，他的一生為追求幸福而來，但當追求金錢和愛情的理想都幻滅之後，他面對這時代「半人半獸」的生活，感到無窮的煩悶和厭倦，他的一生似乎就是無窮盡的值班，而這值班

⁷⁰ 張中良，《五四時期的翻譯文學》（臺北：秀威資訊，2005 年），頁 349-356。

就像是「為了等待著辦事時間而生活著的。」⁷¹ 整篇小說透過意識流動呈現缺少夢想，貧乏、無聊、抑鬱的青春生命，壓抑苦悶的心靈被暗夜所籠罩。

由篷子所譯、潘蒂里蒙·萊蒙諾夫原著的〈黑麵包〉則是蘇聯時期的作品。據翻譯者篷子的介紹，萊蒙諾夫 1884 年生於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家庭裡，他的創作時間橫跨舊俄到蘇聯時期。⁷² 〈黑麵包〉描寫生長於鄉村的勞動婦女開忒林娜發現了在莫斯科工廠裡工作的丈夫外遇，於是帶著「黑麵包」到城裡去抓姦。經過辛苦周折的旅程，她終於找到丈夫的住所，見到她的丈夫和丈夫外遇的對象，她原本以為丈夫會惱羞成怒地把她趕回去，也以為丈夫的情婦會是妖嬈美麗，善於誘惑人的蕩婦，沒想到丈夫溫柔熱情地款待她，而所謂的情婦卻是一個瘦弱、親切也善於勞動的女子，丈夫與「情婦」之間的對話幾乎全是圍繞在工作上。由於丈夫和「情婦」之間明朗坦率的態度，使得開忒林娜忘記了原本所設想的報復，反而將黑麵包當作禮物送給了「情婦」。隔天臨行之前，丈夫和「情婦」給了開忒林娜兩個金角子 and 一包給孩子的禮物，讓她好好回去照顧孩子。這篇小說著力於描寫蘇聯執政初期強調「勞動」的「新人」形象，以及打破原有的家庭秩序，強調「平等」、「友愛」的人際關係。人因為努力工作而顯得自尊、明朗和坦蕩，人際關係也因平等友善而化解可能的衝突，整篇小說的敘述風格因此顯得平和舒緩。這部作品很容易給予知識青年一個美麗的社會主義烏托邦想像，更加堅定地走向左翼的道路。

從阿爾志巴綏夫〈夜〉的黑暗抑鬱，對比萊蒙諾夫〈黑麵包〉的明朗光亮，再次呼應《紅黑》的色彩意象，也彷彿回應著左翼革命的

⁷¹ 阿爾志巴綏夫原作，戴望舒譯，〈夜〉，《紅黑》第 2 期（1929 年 2 月），收入《民國珍稀短刊斷刊（上海卷十一）》，頁 108。

⁷² 潘蒂里蒙·萊蒙諾夫原作，篷子譯，〈黑麵包〉，《紅黑》第 5 期（1929 年 5 月），收入《民國珍稀短刊斷刊（上海卷十一）》，頁 245。

理想。張勇曾分析時代環境對中國二、三〇年代左翼思潮蓬勃發展所產生的助力：一是蘇聯革命成功之後，列寧（1870-1924）在二〇年代實施的新經濟政策讓蘇聯的政局穩定、經濟復甦，國家呈現光明的榮景；二是 1929 年美國華爾街股市崩盤，資本主義國家遭遇猛烈的金融危機，進入經濟大蕭條時期。兩者的對照和差異讓中國青年對馬克思主義充滿想像，期待能用以改造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⁷³ 從這個角度回過頭來看《紅黑》所刊登的兩篇俄羅斯文學，它對照「新／舊」兩個世界「人」的精神狀態的差異，也回應革命時代的社會願望和社會想像。由此再來省視在二〇年代末期至三〇年代初期走上左翼道路的胡也頻與丁玲的作品，也是從二〇年代中期的抑鬱苦悶，逐漸走向三〇年代初期的明朗篤定。

五、結語

《紅黑》是沈從文、胡也頻、丁玲三人在 1929 年所創辦的小小園地，他們在此發表的作品展現了他們對於創作的熱情與認真，而在這裡刊登的作品，既展現他們與時代、社會的對話，也留下創作發展轉折的軌跡。

在三人中，胡也頻與時代思潮的關係最為緊密，秉持著單純熱烈的詩人天性，胡也頻的詩歌繼承了郭沫若對於自然之力的讚嘆，也將這豐沛勃發的生命力投注在對於現實社會的關懷中，《紅黑》中的小說清晰地留下了他的左傾軌跡。丁玲的作品始終圍繞著對於女性生命困境的觀察與思考，1929 年可說是她對於女性主體建構思考的轉折期，此時的創作在《在黑暗中》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具有初步的階級

⁷³ 張勇，《摩登主義：1927-1937 上海文化與文學研究》（臺北：人間出版社，2010 年），頁 113-114。

意識與更為廣闊的社會視野，同時也在〈野草〉中首次確立了「寫作」對於女性主體建立的可能性。沈從文的小說在「愛欲書寫」的題材上有所突破，他摸索出將「愛欲書寫」與「湘西人物、風俗」、「苗族傳說故事」結合起來的小說模式，從而成為三〇年代獨特的鄉土抒情小說家。此外，面對二〇年代末期高漲的左翼思潮，沈從文也有著欲拒還迎的姿態，他在〈一個天才的通信〉等作品中抒發個人寫作生活的貧病困窘，具有頗為鮮明的階級意識，但他反對「革命文學」的教條與僵化，強調文學的獨立性。

從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來看，1929 年出刊的《紅黑》可以說紀錄了三位作家個人在二〇年代末期的創作轉折與發展，也為五四運動之後，經歷了二〇年代中期北伐革命的中挫，到三〇年代之後的文學發展，留下了轉折時期一個觀察的窗口。

（責任校對：葉人豪）

引用書目

一、近人論著

丁玲著，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王增如、李向東編著，《丁玲年譜長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卷上。

王曉明，《潛流與漩渦——論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家的創作心理障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

王燁，《二十世紀革命小說的敘事形式》，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卷4。

吳福輝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1928-193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

李向東、王增如，《丁玲傳》，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5年。

沈從文，《沈從文全集（傳記）》，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卷13。

林華瑜，《「革命與愛情」的現代性敘事圖景——中國現代小說的題材敘事研究》，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

姜濤，《公寓裡的塔——1920年代中國的文學與青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胡也頻，《胡也頻選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茅盾，《茅盾全集（中國文論三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卷20。

倪偉，《民族想像與國家統制——1928-1949年國民黨的文藝政策及文學運動》，臺北：人間出版社，2011年。

- 凌宇，《沈從文傳》，臺北：東大圖書，1991年。
- 張中良，《五四時期的翻譯文學》，臺北：秀威資訊，2005年。
- 張武軍，〈「紅與黑」交織中的「摩登」——1928年上海《中央日報》文藝副刊之考察〉，《文學評論》2015年第1期，頁99-109。
- 張勇，《摩登主義：1927-1937上海文化與文學研究》，臺北：人間出版社，2010年。
- 陳公博，《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北京：北京瀚文典藏文化，2013年影印中華民國十七年〔1928〕五月版本。
- 程凱，《革命的張力——「大革命」前後新文學知識份子的歷史處境與思想探求（1924-193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
- 賀桂梅，〈性／政治的轉換與張力——早期普羅小說中「革命＋戀愛」模式解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年第5期，頁69-92。
- 黃蓉，《丁玲文學編輯活動研究》，上海：復旦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論文，2005年。
- 楊義、張中良、中井政喜，《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圖志》，臺北：業強出版社，1995年，冊上。
- 葉聖陶，《葉聖陶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7年，卷3。
- 解志熙，《欲望的文學風旗——沈從文與張愛玲文學行為考論》，臺北：人間出版社，2012年。
- 魯迅，《野草》，《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卷2。
- 錢理群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1915-192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
- 曠新年，《現代文學與現代性》，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8年。
- 〔日〕秋山洋子、江上幸子、前山加奈子、田畑佐和子，《探索丁玲——日本女性研究者論集》，臺北：人間出版社，2017年。
- 〔日〕倉重拓，〈對沈從文佚文《錢杏邨批評之批評》的考證〉，《中

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 年第 7 期，頁 120-124。

〔美〕舒衡哲（Vera Schwarcz）著，劉京建譯，《中國啟蒙運動——知識份子與五四遺產》，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年。

〔美〕劉劍梅著，郭冰茹譯，《革命與情愛——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中的女性身體與主題重述》，上海：三聯書店，2009 年。

二、報刊文獻

《紅黑》全八期（1929 年 1 月 10 日至 1929 年 8 月 10 日），收入《民國珍稀短刊斷刊（上海卷十一）》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2006 年。

附錄：《紅黑》目錄

第一期（1929年1月10日）

釋名	編者
李太太的頭髮	桂山（葉聖陶）
龍朱	沈從文
生計	沉默（胡也頻）
子敏先生的功課	胡也頻
夜	沉默（胡也頻）
慶雲里中的一間小房裡	丁玲
便宜貨	胡也頻
編後附記	也頻

第二期（1929年2月10日）

過年	丁玲
參軍	沈從文
夜	阿爾志巴綏夫原作、戴望舒譯
一個村子	胡也頻
錢杏村批評之批評	岳真（沈從文）

第三期（1929年3月10日）

神巫故事之一	沈從文
權力與真理	沉默（胡也頻）
三個不統一的人物	胡也頻
初醒	沉默（胡也頻）
小火輪上	丁玲

第四期（1929年4月10日）

苦刑	胡也頻
生命的象徵	沉默（胡也頻）
戀愛者	戴南冠
風聲	沉默（胡也頻）
日與夜	沈從文
編後	也頻

第五期（1929年5月10日）

日	丁玲
七個野人與最後一個迎春節	沈從文
偶像的失敗	黃丙
黑麵包 潘蒂里蒙·萊蒙諾夫作、篷子譯	
兩個大學教授	江蔭

第六期（1929年6月10日）

道師與道場	沈從文
黑夜行	許次寰
野草	丁玲
一個天才的通信	甲辰（沈從文）
噩夢	沉默（胡也頻）
串珠與羽扇	劉開渠

第七期（1929年7月10日）

介紹「到M城去」	丁玲
到M城去	白丁（胡也頻）
欲雨的天色	沉默（胡也頻）

一個獵人的自敘	胡也頻
迷霧的朝晨	許次寰
寄給某編輯先生	甲辰（沈從文）

第八期（1929年8月10日）

一隻船	沈從文
到 M 城去	白丁（胡也頻）
長風曲	沉默（胡也頻）
月	謝冰季
大城中的小事情	甲辰（沈從文）

The Literary View of Educated Youth at a Critical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 A Study of the *Red and Black* Magazine

Min-Yi Su*

Abstract

Between 1927 and 1928, Shen Congwen 沈從文, Hu Yepin 胡也頻 and Ding Ling 丁玲, three comrades who began their writing careers in Beijing, one after another moved to Shanghai and founded the publishing company *Red and Black* 紅黑. In January 1928, they began to publish a literary magazine with the same title. Although *Red and Black* only lasted for eight issues due to poor financial support and divergent literary philosophies, its publication sheds light on many interesting phenomena of the late 1920s, and it marks a turning point in the thought of the period. First of all, the title of the magazine, *Red and Black*, demonstrated the romantic enthusiasm educated youth of the time had toward “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Second, the year 1929 saw an important transition in the writings of Shen Congwen, Hu Yepin and Ding Ling, which is evident in the work they published in *Red and Black*. Third, by comparing their works, one can observe differences in their thought and literary expression, as well as in their dialogue with Chinese literary circles and their views on the reality of the revolution. This article’s examination of the *Red and Black* focuses on the above three issues. It discusses the rich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literary views presented in this publication and describes how it sheds light o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literature, society and history.

Key words: *Red and Black* 紅黑, Shen Congwen 沈從文, Hu Yepin 胡也頻, Ding Ling 丁玲

